

朝鮮朝正祖末·純祖初武將李廷[火集]、李迪父子的 兵學理念

- 以『武臣須知』爲中心

徐成*

I. 李廷[火集]、李迪父子与『武臣須知』的编纂

十八—十九世纪是朝鲜官修兵书的鼎盛时代，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与君主本人增强王权、富国强兵的统治意志，都使得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相对繁荣的情势。而这一社会背景，其实对私人兵书的纂修，亦不可避免地发生影响。如丁若镛『民堡议』、宋奎斌『凤泉遗响』¹⁾等实学儒者的重要兵学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不

* 高丽大学校 亚细亚问题研究院 访问学者。

1) 目前学界针对朝鲜王朝后期兵书与战法的宏观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韩)卢永九 (2002). 朝鮮後期 兵書와 戰法의 研究. 서울: 서울大學校國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 卢永九先生对戚继光兵书的传入、『练兵指南』及『武艺诸谱』的战术、『兵学通』的战略战法等方面，都做了详尽、优秀且有开创意义的考察。近年来，卢永九先生又发表了 조선시대 『武經七書』의 간행과 활용의 양상 『武經七書直解』의 도입, 간행을 중심으로. 조선시대사학

仅仅是文人，武人们也有亲自参与其中的案例。尽管在朝鲜王朝长期崇文抑武、以文统武的状态下，武将相对于文官，声音一直是较为微弱的。但武将由于长期的军事教育熏陶与丰富实地军事经验，所著的兵书，往往是简约可行、易于实操的。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李廷[火集]、李迪父子的『武臣须知』，笔者将以此书为中心，对其作者、成书过程、内容及理念进行简探，并借此关照十八世纪朝鲜王朝地方武官的兵学理念，增加对朝鲜王朝后期官私兵学实践的理解。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现藏一部李廷[火集]初纂、李迪续补校订的『武臣须知』，为朝鲜纯祖九年（1809）芸阁印书体混补字版本，线装1卷1册，四周双边，半郭 21.4 厘米乘14厘米，有界，半叶10行，行20字，卷首钤朱文方印“李王家图书之章”。卷首为“戊午三月丁丑”李迪序、“崇祯纪元后三丙寅季春”领议政李秉模序、“己巳暮春”德隐病夫金载瓚序，卷末为“青牛南至日辛亥”行工曹参判兼禁卫大将李仁秀题跋。戊午三月应当是1798年农历三月，崇祯纪元后第三个丙寅年即1806年，己巳暮春应是1809年农历三月左右，青牛南至日则应是1805年农历冬至日。可以推断该书的编定大致发生在1809年之前，而请人作序、刻板刊行等各种工序则大致发生在1798—1809年之间。

按李仁秀题跋，“完山李迪，字惠伯，系出濬派，其考讳廷[火

보第80辑，2017，考察了『武经七书』在朝鲜刊行及流传。另外，崔炯国也对正祖时期的兵书编纂与正祖文武兼全论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值得参考，参崔炯国（2012）：『正祖의 文武兼全論과 兵書 간행 一認識과 意味를 中心으로一』，『역사민속학』 39；尹武学则对朝鲜后期诸如『续兵将图说』、『武艺图谱通志』、『兵学通』、『兵学指南』反映出的兵书编纂思想做了梳理与考察，参尹武学（2013）『朝鮮 後期の 兵書 編纂과 兵學 思想』，『한국철학논집』 36。但具体到『武经七书』及戚继光兵书影响下的『武臣须知』，学界的研究不算太多，且基本集中于简要的文献解题层面，如甘成海、成百晓翻译（1986）『무신수지』，서울：국방부전사편찬위원회；郑海恩（2004）『한국 전통 병서의 이해』，서울：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413—423，都做出了先行研究。但关于该书的成书过程与兵学史上的意义，其实还有更多可以探讨的空间。

集]”。璿派即王室，说明李家出自王族。查朝鲜王室的两种族谱『璿源系谱纪略』及『敦宁谱牒（大王编）』，可以梳理出李家的具体先世如下：

宣祖第九子庆昌君李珣（贞嫔洪氏出），娶检阅曹明勗女，所生第四子昌城君李必；李必娶庶尹韩禕女，生独子清川君李濂；李濂娶判校朴昌文女，所生长子密城君李栻；李栻娶郡守金盛达女，生廷炜、廷焯，娶一妾，生庶子廷[火集]。²⁾李廷[火集]以“妾男”庶子出身，虽然在正祖时期有打破嫡庶界限的倾向，但整体上还是改观不大，庶子出人头地仍有阻力，所以他选择了武科科举来进入仕途。廷[火集]历官营将，娶护军申命天女，生李迪。最终官至府使。³⁾从出身来看，李廷[火集]父子这一支基本上是王室庶子的庶子后裔，宗派已经比较疏远，到廷[火集]本人这一代，并没有沾到天潢贵胄的一命之荣，只能依靠社会相对歧视的武科来进入仕途。

如前述，迪字惠伯，廷[火集]独子。此前研究中，对李迪的生年尚有不明确之处，⁴⁾其实，查李迪参加的那次武科考试记录『癸未大增广别试文武科榜目』，载“通德郎李迪，本完山（按即王室全州李氏），居京，戊午生，元一所，父营将廷[火集]，下雁行”，于英祖三十九年癸未（1763）中式武科大增广试丙科117名，⁵⁾此年之前的戊午年只有英祖十四年（1738）最为接近，故知李迪生年为1738年。而关于李迪的宦途，资料较少，唯书前李秉模序提及秉模按“岭节”时“李令（迪）宰南海，政清民安，第一考曰永除馘弊，岛氓户歌；第二考曰随事不挠，阖境赖安”。⁶⁾“岭节”即庆尚道观察使的雅称，根据『朝鲜王朝实录』，李秉模任庆尚道观察使是在正祖六年（1782）到正祖九年（1785），⁷⁾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李

2) 璿源系谱纪略 卷12 宣祖大王内外子孙录，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刻本，47b。

3) 敦宁谱牒（大王编）第6册 宣祖昭敬大王，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刻本，106a。

4) 郑海恩 (2004). 한국 전통 병서의 이해, 서울: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2004, 413.

5) 癸未大增广别试文武科榜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107。

6) 李秉模. 武臣须知序，载李廷[火集]、李迪. 武臣须知，1a。

迪曾担任南海地区的县令职务。以上便是李氏父子的家世出身等个人资料。

那么，李氏父子为何要编纂这样一部兵书呢？根据李迪本人的自序，其动机如下：在“国家升平日久，疆圉固谧，烽尘不警，而武士无所用其能，才官亦不施其艺”的状况下，社会已经普遍文恬武嬉，几乎没有“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无患”的意识。李廷[火集]面对此情此景时，不胜慨然，所以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兵书中“拈出将才、经权、阵法等三节，各立纲领，又设条目，以便服览”，命名为『武臣须知』。但可惜不久之后李廷[火集]重病，于是召来李迪，托付未完的这部书稿。⁸⁾

李迪按照其父的谆谆教诲，对包含『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在内的『武经七书』，详加参考，各自梳理出要旨与优长之处，如『六韬』姜太公的“规模阔大，本末兼该”，『孙子』的“诡谲蕴深，穷幽极眇”，吴起的“醇正简要”，『司马法』的“缜密谨严”，黄石公的“智术宏渊”，『尉缭子』的“峻法明刑”，『李卫公问对』的“辨析精微”，都一一究明，“已有先觉之提牖”。同时李迪认为，“学贵识要，务在诚实，若以外应文具，内实罔殆，则虽日阅千签，心函万轴，徒为观听之美而难见实效之着”，并援引戚继光“悟其法而不泥于法”的名言，强调不拘泥死板的重要性。因为当时的朝鲜兵家与武人，“全不运意于一统，解晓其本末，只以引证出处，看作先辈之肯綮，而且囫圇说去，于注释之上、章句之间，以为应举之捷”，完全是敷衍了事，主要目的成了应付武举考试。所以学习兵书，不可犯以上诸弊，“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否则完

7) 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卷14，正祖六年十一月六日己亥条；朝鲜王朝实录·正祖实录，卷20，正祖九年八月十五日壬辰条。

8) 李迪，武臣须知自序，载 武臣须知，1a—2a。

全就是纸上谈兵。9)

李迪将『武经七书』所含的孙吴、六韬三略等兵法删繁就简，取其扼要，逐段演绎阐述，便于理解。纵观全书，『武臣须知』主要分为三个模块来论述：一，将才；二，经权；三，阵法。其中，将才篇末附录有习弓马、重文墨、养气力、审取舍、明奇偶、图山川、治器具、诫酒色、善人谱、将才次第图、将家总论，共11个附属要点；经权篇则附录报国、任势、禁令、行军、料敌、望气、守城、攻城、经权互施图，共9个附属要点；阵法篇则附收了八门蟠蛇阵图、蟠蛇阵解、卷地阵图、卷地阵解、选士、权变、知敌、伏兵、水火、心气、形兵、决疑、穷寇、奇计、刑赏、先察、反间，共17个附属要点。可以说包含了当时军事经验体系下战略人才的选育、作战经验的熏陶、具体战法的解释，是一部融汇了具体军事体验与宏观军事视野的兵书。

II. 「武臣须知」的将才观

李氏父子把“将才”列为武臣应当了解的第一要义，而成为将才的重要一点，就是在具备才干的同时，拥有不偏不倚、中和允当、始终如一的品质。『武臣须知』中云：“将才者，将帅之才也，统军持势曰将，料敌制胜曰才，盖人之才具必以尽美而言，非一能夸众之谓也。”同时，书中也强调：“将才自古难之，虽有才率多一偏之失，不偏不倚之谓中，一偏即中之失也。虽有才能之可称，不有其始终如一之方，则每多致败于垂功之际，可不惜哉！”这一观点，其实来自于中国传统兵书『黄石公三略』：“夫统军持势者，

9) 李迪. 武臣须知自序, 武臣须知, 2b. 本文所参考的『武经七书』为北宋官修, 今人骈宇塞等译注(2020). 武经七书, 中华书局. 但由于『武经七书』由先秦到唐代七部重要的单独兵书所构成, 故本文在追溯比较时, 优先选择参考每部兵书的原始版本或目前学界最佳的整理版本。

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¹⁰将帅是统领全军的核心，有料敌制胜本领的将帅即为将才，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既有才干又能不偏不倚、终始如一的将才尤其难遇。拥有才干却性格偏狭不足的将帅，往往功败垂成，在这里，『武臣须知』对比了三国时期邓艾与诸葛亮的例子，来说明才华与求“中”不可偏废的重要性：

昔邓艾有奇才异能，一举平蜀，而乃以径情直行之失，反召槛车之祸，即此一事而论之，善败由己而不由于人矣。噫！其惟全之者，诸葛亮乎？有英雄豪杰之才，而有忠臣义士之节，解带泻诚，陈力趋列，平物我，合内外，而夙夜忧叹，至忘寝味，众流靡靡，一柱亭亭，瞻仰难近，不翅星斗。虽以窈人小夫而观之，惕然自罪，亦岂不醒心改图之不暇乎？¹¹

邓艾多谋善断、精于用兵，然性情偏狭刚直，破蜀之后，“深自矜伐”，曾向蜀国士大夫夸耀：“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又曰：“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还动辄殴辱下属，居功自傲，虽“矫然强壮，立功立事”，却“暗于防患，咎败旋至”，最终惨遭极刑。¹²而诸葛亮在才气纵横的同时，又能忠恕宽和，处事公允，弭平物议，使得蜀汉朝廷内外相维而不掣肘，一时间“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蜀汉呈现出“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面貌，¹³对照邓艾，可谓是成功的案例。但是，李家父子也意识到“近世人才衰少”的现状，所以也坦承“不可以责备”，无须求全。不过，李家父子也援引了古人“才不借于异代”及“彼丈夫，我丈夫”的格言，来倡议“后之学者”，要“存心处事，必以敬简，一久不移，渐入深

10) 魏汝霖校注译解(1976)《黄石公三略》，台湾商务印书馆，21。

11) 武臣须知·将才篇，1a—1b。

12) 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中华书局，779、797。

13)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930。

透”，就不必“患乎异续之不如古人”。¹⁴⁾意即将领要克服偏执狭隘的性情，追求不偏不倚、内外合一、允执厥中的目标，便可在发挥才能的基础上建功立业，不至于功亏一篑，为世所惜。这是『武臣须知』所强调的为将第一原则。

作为将才，还要懂得“文以齐之，武以威之，万人一心，所求必从”，书中云：“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以此言之，不可废一可知矣。”为了强调文武兼备的重要性，作者在此对比了宋襄公、成安君的形式主义仁义战争观与秦始皇、项羽的武力暴力战争观：“昔宋襄之仁，成安之义，是为徒善，后世之貽笑招讥，不亦宜乎！楚之项羽、秦之始皇，专任强暴，不有仁义，毕竟败无有余地，是岂非前车之可戒乎！”认为徒讲善良仁义与一味依存暴力都不是可取之道，只有“齐之即抚存归一之意，威之乃严畏收敛之谓也”，才可以在军事力量的威慑与以理服人的名分结合下，获取战争的持久胜利。因为“天理专在于好生之德，而至于肃杀有不余力，以此推之，人事亦然矣”，所以“当途临事者”（当道掌权者）如果能“勿论巨细，必以宽、猛二字，务从公平，实心做去”，则“斯过半矣”，能解决不少问题。著者也慨叹：“为将之道，舍此而何求？”在平常的“日用百为之间”，“自有肯綮，制以画一，名实俱存，毫发不爽，然后可谓善之善矣”，如果“懒而莫振，强而不屈”，则必于“做事之际，立见其狼狈之无限”，著者认为“盖论之文武一道，行已接物，并用不悖，则自然识高而量大，弛张阔狭，如中规墨”，¹⁵⁾兼用文武，两不偏废，方可无往不利。

『武臣须知』强调“将有五慎、五施，终日钦钦，如常对阵”，也就是五种慎重之法、五种施行之则，五慎，即“治众如治寡”、“出入如见敌”、“临阵不怀生”、“虽克如始战”、“法令从略而不苛”；五施，即信、勇、严、智、仁，详细来讲，“诚一无欺，金石

14) 武臣须知·将才篇，1b。

15) 武臣须知·将才篇，2a—2b。

不渝之谓信”，“果敢倡先，冲锋陷阵之谓勇”，“军政整齐，号令明肃之谓严”，“无所不知，料敌虚实之谓智”，“爱恤士卒，不忍惨烈之谓仁”。¹⁶⁾五慎观最早来源于朝鲜王朝武将常读的吴起兵法，『吴子·论将篇』认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因此，吴起提出“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其中，“理”即“治众如治寡”，“备”即“出门如见敌”，“果”即“临敌不怀生”，“戒”即“虽克如始战”，“约”即“法令省而不烦”，所以“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¹⁷⁾五施，即『孙子兵法』所讲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¹⁸⁾李氏父子认为：“将者藏之胸臆，而夔夔然有恭畏之心，荡荡然无较量之意，随时应事，以得适宜，而不可以放纵不收也。”将这些法则内化为将帅本人的心中行为准则，则可以临敌不惧，随机应变。

『武臣须知』强调为将者又有“十守”之原则，“十守而不动者建心窃冥，藏志九旋”。十守，即“神清而不可浊”、“谋远而不可慕”、“操固而不可迁”、“智明而不可蔽”、“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噬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不可怒”。¹⁹⁾这一观点，源自『淮南子·兵略训』：“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迁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贪于货，不淫于物，不噬于辩，不推于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²⁰⁾谈及当时将帅们普遍浮躁的现状，李氏父子慨叹道：

16) 武臣须知·将才篇，3a—3b。

17) 〈战国〉吴起，今人陈曦整理点校。吴子集释，卷4，论将篇，中华书局，2021，181—185。

18) 〈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中华书局，1999，7。

19) 武臣须知·将才篇，第4页a。

20) 淮南子集释，卷15，兵略训，中华书局，1998，1091。

『黄石』所谓“将谋欲密”，『孙子』所谓“将军之事静而幽者”，岂非沉着稳帖底意思乎！噫！今之人也，则不然，以偏躁谓敏于行，以持重谓缓于事，而其所谋画，非出于轻浅，或失于草率，至使傍观败露无余，是可谓遮眼攫金者也。²¹⁾

在倡导五慎、五施、十守等孙吴时代的传统将帅守则之外，『武臣须知』还强调将才要重视“手足五官”、“广推择”、“重赏罚”、统一号令、远离贪腐、谨守职责不越分等条件。“手足五官”即五种如同将帅手足般的属官，也就是：1.“知勤慢、论刑赏而军法从事”的军正，即司法官；2.“动静时，吏卒辨连什佰，明旗鼓”的尉官，即传令官信号官；3.“前后知险夷、见敌知虚实、发斥不遗”的候官，即侦察官；4.“隧路逐行、念辘治赋、丈均处军、辑并竈通”的司空，即管粮官；5.“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的舆官，即管理车轿辎重、负责殿后的官员。而这其实也是受『淮南子』、『武经总要』影响下的认知：“论除谨，动静时，吏卒办，兵甲治，正行伍，连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尔（尉官）；营军辨，赋地极，错军处，司马之官也；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亡遗，此候之官尔（候，军之虞侯）；隧路塞，行辘治，赋物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尔（军司空，主善治）；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浮舆，无遗辎，此舆之官尔（舆，军之后殿者）。然此五者之于大将也，若车之有众材，各司其任，未足以宰制一车之用也。”²²⁾总之，李氏父子认为，“为主将者，必谨择人，而各因其才，任其势，使之如吾手足也，故鼓不与五音，而为五音之主将，不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之督”。强调主将要因才任使，分配好各种擅长相关领域的人材到适合的岗位。²³⁾

21) 武臣须知·将才篇，4b。

22) 按“营军辨，赋地极，错军处，司马之官也”乃于省吾先生据唐抄本补，淮南子集释，卷1 5，兵略训，1058；武经总要上，卷1，制度一选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2。

23) 武臣须知·将才篇，5a。

因为“自古雄武方略之士，或奋于列校，起于徒走”，所以要想选拔他们，“计莫如广推择”，也就是“取才择发之公平也”。也许是悲哀于自己庶子的出身限制了自己的施展抱负，著者此处不无感慨地说：

昔之剧孟，布衣也，而亚夫隐之若敌国；余玠，鄙为粗人也，而卒手掣全蜀以还本朝。齐之穰苴，汉之卫青，迹自微贱，而受钺登坛。以此观之，惟在简拔之如何。而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非期牙之相知，又非时数之并至，则亦何有徐、葛之走荐乎？其不可以地微道穷乃自废也明矣！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甯戚饭牛车下，辱身下志，隐忍苟活，是岂非贤者诚重其死之义耶？观此论之阅历风霜，备尝辛苦者，能多成功。然则曹刿所谓肉食谋鄙者，不亦此意乎？司马温公曰：“先门地后贤才，晋魏之深弊。”大抵张官列位，专为民、国，门地贤才，一时并用，门地修贤才，贤才修门地，岂不美哉！推择之道，柴世宗曰：“后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乃命大简，精锐者升之，羸弱者斥之，此法古亦有之。齐之决命，吴之解烦是也。朱子曰：“核军籍，汰浮食，岂可以疲癯残疾，苟然充数于鞞毂之下乎？”试取之际，身言书判之用，即唐之古制而今之行也，则虽出于存羊之义，而终归虐套，是与掩耳偷铃奚以异哉？²⁴⁾

朝鲜王朝是非常重视门第本贯与阶级等差的社会，所以出身寒微庶孽之人，²⁵⁾基本就与飞黄腾达、出将入相无缘。『武臣须知』的作者面对这一社会阶级所面临的普遍性窘况，做出了如下思考：推此思之，理国之要在文与武，而近来文武之积滞，未有甚于此，文武荫交递之论，盖出于均平之计，事系官制，猝难变通，出

24) 武臣须知·将才篇，6a。

25) “所谓庶者，良妾子也；所谓孽者，贱妾子也”。在朝鲜王朝时代，庶孽阶级在政治、法律等各层面长期被禁锢，比如科举考试不得参加文科，只能参加武科或者医科等杂科，充当中下层武臣或者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嫡子而言前途黯淡，极少有荣登高位的案例。参张晓波、崔铁男（2016）. 禁通之间：朝鲜王朝庶孽制度初探，『韩国研究论丛』36。

身一倍尤甚，归属无处，终老庸下，是岂不干和之一端乎？或云欲救此弊，一则贵科甲，二则罢履历，三则广推择，未知然否？盖其抱道宏儒，宿德龙臣，布列朝野，雅仪魁颜，雄武方略，各守职业，则万事乃理，理势常也。故孔子曰：“志士不忘在丘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愚于此盥手敬读，而炯然方寸，不翅若秋月寒江也。26)

其期待破除履历、门第、出身歧视的心情，可谓跃然纸上。其实，这种心境不独李家父子如此，而是整个朝鲜王朝时代的通病。朝鲜末期儒者黄玹曾对这种庶孽不得登用的状况描述道：“俗呼庶孽曰椒林，以椒味孽孽然也，……，琐屑卑贱，虽出自卿相之支，而品第等级仅与中人相齿，故通称中庶。”庶孽们“宦途既积，只营口腹，或业武止于营将、中军，或依营幕为裨将，或寓郡衙为册室，或从荫路”，“内则学官、检书，外则察访、监牧官，龙钟潦倒，其贱愈甚”，所以有志气者“白首穷饿，宁以潜蛰为高”，最终“才俊枯落，为有识之忧”。朝鲜王朝数百年来，“非无通融之议，而仕宦既通，则势权必分”，因此“世卿之家，百方搪塞，勿越其科臼之外，有若纲常名分之不可紊者”，27)高门势族为了既得利益，根本不肯从内心接纳庶孽阶级。

撰述『武臣须知』的李氏父子，虽然不完全是社会上的庶孽阶级，李迪也借助作序与李秉模、李仁秀等高级官员有所往来，但是毕竟是王室的远支庶子，整体上仕途并不显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遭遇着类似制度性的困境。好在正祖即位以来，意识到社会对庶孽阶层的压制，故而采取改革、从中选拔人才：正祖拣择了朴齐家等庶孽出身的文人担任奎章阁检书官，逐步淡化对这一阶层的歧视。李氏父子也是在因应这一时代思潮下，借助自己阐述选拔将才意见的机会，发出了“贵科甲、罢履历、广推择”的社会改革呼声。

26) 武臣须知·将才篇，6b。

27) 梅泉野录，卷1，甲午以前上·庶子出世者，93。

要成为将才，还必须重视赏罚问题，“赏罚无章，何以沮劝？女子可兵，市人可战”，“赏罚，军中之大务也”，有“沮恶劝善”之功，李氏父子认为，因为“有平日之工夫，乃见临时之责效”，²⁸⁾所以要从平时开始贯彻。其援引卫武侯设立三行宴、孙武在吴斩首立法的例子，来证明若无赏罚来作矫正、激励，则虽“点额鞭扑，亦何所益”；又援引马隆未战先赏、吴子败亦行赏的案例，来说明孙子“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和戚继光“言语之威畏如刀锯”的名言。可以说是“不费一金，感深积恩”，“发一令而可当挟纆，诛一恶而一壁改色”。²⁹⁾这其实就来源于戚继光训练将帅时“练恩威”的思想：

乌合之众，上下不亲，非有赏罚，孙吴不能以为将，夫赏不专在金帛之惠，罚不专在斧钺之威。有赏千金而不劝者，有不费数金而感深挟纆者，有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而畏如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此盖有机。机何物也，情也。理兴于心，情通于理，赏之以众情所喜，罚之以众情所恶。或申明晓谕，耳提面命，务俾人人知其所以赏与罚之故。感心发则玩心消，畏心生则怨心止。微乎，微乎！用之正则圣人所谓王道仁者之事也，用不正则圣人所谓五霸智者之事也。³⁰⁾

恩威并施，令行禁止，就能贯彻上下，不敢怠慢，从而激发将士们的积极性。李氏父子认为，“政令直从人心一点欢喜中出来，则必奋发于翻然勃然之顷，其所图报之事，亦在于意外”，必会收获意外的功效。在此，李氏父子慨叹：“武臣之贤否长短，文宰有难详知，故古例从将任之公议施行，今不如古用人之道，似不得其实矣。”³¹⁾其实也是针对朝鲜王朝文官对武官过多辖制约束、使之

28) 武臣须知·将才篇，6b—7a。

29) 武臣须知·将才篇，7a—7b。

30) 练兵实纪，卷9，练将第九，中华书局，2001，190。

31) 武臣须知·将才篇，7a—7b。

不得其人的批判。

『武臣须知』还提出了另外几条将才应注意的问题：比如，作为将才，必须重视将令划一的问题，因为“将无二令，还令无多，门无姑息”，为将者应当深思熟虑，“传令一出之际，更加详审精密，置水不漏”。如果号令不全，则威权有分，兵柄假手于人，则自取败灭；³²⁾为将者，更不可贪赂而内顾，不可迁怒而贰过，因为大将“建牙纛，握刀剑，拥万众，指挥三军，规模先设，节制已定”，其“严威庄肃”，岂可“以毫末之累、纤芥之私萌于心而发于事”；³³⁾为将者，要“举不失职，爵不踰德，师不凌正，旅不逼师”，也就是“职分内事各有所掌，可无越俎之嫌”，各司其职，不得越矩，更不可凌逼下属，秩序倒错；³⁴⁾为将者，在军中不必拘泥礼节，要“和而不流，仰而不屈”，比如穿戴甲冑时不必下拜，见到车马不必匍匐；³⁵⁾为将者更不能在军中繁文缛节，扭捏作态，故为“揖逊”，军容要“果毅尚义”，昂扬进取；³⁶⁾为将之人，还要重视屯田，储备“丰裕”，提前做好后勤粮饷和休整问题。³⁷⁾

作为将官，还必须重视“君臣之义”，要“善处功、能包容”，要心怀“精诚”，要与士卒“平分甘苦”。平常，将帅要以民众为“体”，民众要以将帅为“心”，那么“出入进退，惟在将之掌握”，将领就能居小驭大、指挥“百万之众”而如同“弄婴儿于股掌之上”，同时还要不计小失、博恩广施，让士卒兵民推心置腹。赴难时“激昂慷慨”，平日“敬慎威仪”，³⁸⁾才能感染激励，上下一心。李氏父子叹息曰：“自春秋战国秦汉，迄于隋唐宋明，为将帅而卫国安家，终始如

32) 武臣须知·将才篇，7b—8b。

33) 武臣须知·将才篇，8b—9b。

34) 武臣须知·将才篇，9b—11b。

35) 武臣须知·将才篇，12a。

36) 武臣须知·将才篇，12b—13a。

37) 武臣须知·将才篇，13b—14a。

38) 武臣须知·将才篇，14b—23a。

一，能无失于一偏之诚者，历历可数，而犹未及百人。始知自古之难得者也！”由此，其总结教训，升华出一“过”一“德”这两个“为将之道”，“为将之过”是“性猛急而不容众，骄傲而耻下己，矜贵位而恶贫贱，贪爱而无信义，拘执而不变通，有过而恶闻”，“为将之德”则是“有信义而严明，能厚礼而待士，必深谋而远虑，轻财而好施，隐恶而扬善，壅谗而不听”，至于选择“过”还是“德”，则任由为将者自己考虑取舍。其余“才武方略之称，亦非别般底道理”，最后还是归于此两种道路上来。³⁹⁾

大部分武臣的文化条件，相对文官是偏弱的。而且军务倥偬之间，不便于虚文故事、铺陈衍繁。因此，『武臣须知』在将才篇的后半部提纯凝练，把古代“哲人之余风遗烈，而嘉言善谋，则辄记其大意，以资便览”，并以“武臣之日用紧务，作为八条，开列于后”，一共总结出八种简要法则：

其一，要“习弓马”，弓箭马术是为将的武艺基本功，而且练习弓马，还能学习到荀子所言的“相时随力，有所通变”的品性，达到“君子之射，正己而发，失诸正鹄，当反求诸身”的自省效果，还可锻炼胆气，培养魄力。⁴⁰⁾

其二，要“重文墨”，『百将传』中的名将大多以博学洽闻驰名于青史，“盖不出户庭而知天下，处于今世而知前古圣贤王霸之略、忠君爱亲之道、立身行己之方”，提高文化水平，才能够在不受蒙骗的同时洞察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在处理军务时，“事有深闭，机多固秘”，若不能亲自“手裁”，而“付之他人”，则必有“疎漏之患”。⁴¹⁾

其三，要“养气力”，气力有清浊之分，“果而锐，健而能久，勇而能决，敏而不轻者，气之清也；厚而钝，塞而迟延，缓而不及，

39) 武臣须知·将才篇，24b—25a。

40) 武臣须知·将才篇，26a—26b。

41) 武臣须知·将才篇，27a—27b。

满而不重者，气之浊也”，在古代，“有临大事、决大议，而不惑刀锯，升钱在前而不懂者，亦皆明理养气之力”。所以要培育元气、养精蓄锐，具有充足的精力来处事。⁴²⁾

其四，要“审取舍”，凡事有巨细，也必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若或耽耽逐逐，不知此理，则应接不顺之外，祸败之来，何可胜言”，因为“心之趋向，本自无常，而惟人所操舍”，福祸无门，惟人自召，所以要懂得取舍选择。做事不可贪多求全，交友不可不分损友益友，其中“用人取舍”，尤为难事。为将者，要懂得日常诸般人情事物的取舍之道。⁴³⁾

其五，要“明奇偶”，奇偶即阴阳之理，在朝鲜王朝性理学世界起源观的影响下，李氏父子认为，“所谓太极剖判分为两仪者，而人事在于中矣。日月星辰，风云鸟蛇，山泽草木，收藏生发之事万虽殊，而终归于一，其微而莫微，俱是可知”，世间万物，“皆原于河洛生成之理”，因此，为将者“不可不博学无方而无所不知”，至若风水、相人、相马、卜数、医药等说，也应该有所了解，以便于推理事物、通达人事。⁴⁴⁾

其六，要“图山川”，在这里，李氏父子引用『管子』“兵幸于权，权幸于地”⁴⁵⁾与『黄石公三略』“能表险难，能制军权”的名言，⁴⁶⁾又举了邓艾“每逢高山大泽，辄规画军营处所”以及诸葛亮“以荆益之图常挂壁上”的案例，来说明绘制山川地图、精通地形勘测对作战的重要性。同时，李氏父子也针对朝鲜王朝的疆域地理，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经验，对关防要害提出了独到看法：

42) 武臣须知·将才篇，28a—28b。

43) 武臣须知·将才篇，29a—29b。

44) 武臣须知·将才篇，30a—30b。

45) 典出管仲所著管子：“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管子校注，卷9，霸言第二十三，中华书局，2004，464。

46) 典出『三略』引『军谶』曰：“将能清，能静，能干，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黄石公三略，22。

我国地方，南北不过三千二百二里，东西只是一千二百三十里，难云小国，名山大川，则足可玩赏矣。愚之所跃履者，未免磨铠之自遐矣，而亦考輿地，当有所规画，则大约其北路之摩云（利城）、摩天（吉州）、铁岭（安边），岭东之大关（江陵）、楸地岭（三陟），岭南之鸟岭（闻庆）、竹岭（丰基）、火岭（宜宁）、秋风（金山）、挂方岭（奉化），湖南之八良岭（南原）、万马洞（全州）、大小芦（长城），海西之青石洞（开城）、洞仙岭（凤山），关西之慈母（慈山）、铁瓮（宁边）、清川（安州），俱是关防之大处而犹未尽襟袍，固密为相声援之道，至若忠州居国上流，宜有江边之备；鸟岭有御留城而天造之险，实为东南之第一，亦当修筑，宜为扼项控制之势。至于近畿，松都之青石洞，甚为要害，必依柳西崖所见，可筑甬道。且以都城论之，坚守持火，莫过于此。西北则高峰绝壁，万夫莫开，而第东南平低。若得专力守御，则牢不可破矣。或者议之蠶岛江水，塞之灌入东城，则城沉云，此诚过虑矣。攻城不可以久，兵志所在奚眠，转回大江而征王兵，一两月内，各自会合，其时有可得从中变通之道，且掘置丈五之沟，则无患矣。又以城阔难守云尔，则人民之繁盛，即八道中第一负固也，何可轻易弃之乎？弃之则宗社之所重，人心之瓦解，何以为之？人心如水，无水而何可载舟乎？龙蛇之乱，足可鉴戒耳。我国之善守城，自古有名称，隋炀帝唐太宗皆不能击破，则可以知地形人心之固，而预备守城之具，亦可想也。⁴⁷⁾

李氏父子就朝鲜八道区域，皆选出形势可恃的险峻要隘，如咸镜道之摩云岭、摩天岭，江原道之楸地岭，庆尚道之鸟岭，全罗道之八良岭，黄海道之洞仙岭，平安道之慈母岭，希望能各建守御，犄角相援；南汉江流域，则以忠州为至要，当备水军；京畿附近，则须重视开城。书中还对比高句丽时期守城的成功案例与壬辰倭乱时宣祖弃城而走的失败案例，来说明“地形人心之固”的重要性。若

47) 武臣须知·将才篇，31a—32b。

是信心一失，慌忙逃走，无异于自乱阵脚，便会轻易为敌所破。

其七，要“治器具”。李氏父子批判当时的许多“拥鬯”武将们，他们佩戴的弓箭虽然外表华丽，但“弓不能深弯，箭不能穿札，而若值风雨，触手碎落”，在兵凶战危中根本充当不了“缓急之资”。其盔甲战袍，也是追求“华丽轻捷”的外貌主义。李氏父子称赞“岳武穆之背嵬甲、磨札刀”是让“泰山可撼、岳爷军不可撼”的原因，由此，其呼吁整修精锐兵器乃紧要之务，兵器是军人作战的依赖，没有精善锐利的兵刃，在战场上就会有战败之虞。此外，还要注意马匹的整顿保养，“人马能得相亲，及遇仓促，不误驱使”，⁴⁸⁾方可在战争中所向披靡。

其八，要“诫酒色”。若为将者“贪花醉柳，乃忘平和而不恤其六疾之诫”，“一杯复一杯”，最后就会“长醉不醒”、“便作病风”，乃至玩物丧志、迷失本性。⁴⁹⁾八条之外，李氏父子还附上了“善人谱”一节，也就是平常的一些待人接物的办法：比如喜怒哀乐要遵守中庸之道、“适中之行”；又如要常常反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如，对人接物，要内存精明、外示浑厚；要“耐气守柔、一团和缓”，要“竭忠尽效、满口公平”，要“谦虚好问，容受尽言”，言语之间，必须“思人之忌讳”，尊重他人；要“不贵人小过，不发人阴私”，要“无以小嫌疎至亲，无以新然忘旧恩”，这样才能使人心服悦，等等。⁵⁰⁾

III. 「武臣须知」的经权观

经，就是常道，长期不变的道理；权，就是权变，随机权变的

48) 武臣须知·将才篇，33b—34b。

49) 武臣须知·将才篇，35b。

50) 武臣须知·将才篇，35b—37a。

道理。世间万物，既有恒常不变之道理，也有临机应变之现象。培养通达经权的意识，对将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李氏父子对此解释道：“盖事变之来，参差不一，何可守常而不知合变乎？”所以统治者若想经权得宜，就需要培养如下的观念：

首先，要慎修武备、常怀兵机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恒常之理。一个国家，不要借口没有战乱，就忽视武备之道，“黄帝制兵，即有兵之名而欲无兵之义”，如果全国上下沉湎不振，“一日无兵，便有一日之危；一处无兵，便有一处之危”。在具有危机意识的基础上，为将者做决策还需要不盲从流俗、有独到见解。李氏父子援引『商君书』中所载郭偃的名言“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来说明独立决策机宜、不受外界影响的重要性。因为“大抵天下事以古今之异宜随其变，而极则反、劳则佚、盈则亏，恒物之情也”，所以不可以“拘文牵俗”，更不能“一向执迷而不悟”。⁵¹⁾正如『商君书』中所载：“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疆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⁵²⁾因为手下大众繁多而意见不一，且大部分人并不具备高度理性的判断能力与战略眼光，因此一旦无人指挥，几乎不可能达成较为统一的行动。换言之，若在作战时一味众声喧哗，则只会导致己方阵营撕裂，政令不能划一，很难取得胜利。因此，李氏父子借用管仲“独明者天下之利器，独断者微密之营垒”⁵³⁾与姜太公“智如众非人师，巧如众非国工”的话语，⁵⁴⁾来说明为将者必须有“自家方略”，⁵⁵⁾而不能人云亦云，为繁杂舆论所牵制。

51) 武臣须知·经权篇，40a—41a。

52) 商君书·雄指，卷1，更法第一，中华书局，1986，2。

53) 管子校注，卷9，霸言第二十三，468。

54) 典出六韬：“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事莫大于必克，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六韬·龙韬·军势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16，185。

朝鲜王朝从“两乱”（“倭乱”与“胡乱”）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发生，可以说“升平日久，边关无事”，社会上普遍发生着“人心亦从懈忽而堕容”的现象，所以在武事层面，也有“虚疎”之弊。长期承平带来了散漫懈怠，也给军队带来了五种弊端：“闻烽举而色丧，语合刃而股栗，遑遑失措者，是怯也；夕弛担而坐市门，朝树羽而鼓之前，面面相顾者，是偷也；问其攻杀击刺之所以然而不知者，是慢也；即令即发，神速为主，而逗遛内顾，盘桓不进者，是弱也；禁群去疑，然且不避，而风声鹤唳，惹起闹端者，是惑也。”所以，“非诚莫定，无严难振”，为了应对怯、偷、慢、弱、惑五种弊端，只有以精诚团结稳定之，以严肃军纪振作之。李氏父子观察到，“近来将卒之间，等级寻常，体礼扫如，元无爱严之相，及有若行路之相视”，可以说是毫无孙武子“所谓‘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之意。因此，他们援引『司马法』“堪任简治”的古训，提倡“堪任事物，简用人才，必选其望重于人者”，⁵⁶⁾建议把他们“挨次升擢”，“一为壮军声，一为增吾强”。还要彻底贯彻纪律，让军营中“但闻将军之令，而不闻天子之诏”，以此“严立铁限而无相违越，如金石之不渝”，那么，“使三军难赴水可也，蹈火可也”，积弊必可除去。⁵⁷⁾

为将者，要慎重出招，不可轻动。因为“用兵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着或误，莫可收拾”，李氏父子对此分析道：“大抵临阵对敌，有如棋局之相对，势均力敌，两相蚌鹬。而若或一手之着，先自误了，则其破竹之势何能救止？”典型的案例就是“赤壁曹操之冒行”与“夷陵昭烈之过举”（即刘备夷陵之败），都是“奚但一误，是

55) 武臣须知·经权篇，41a。

56) 典出『司马法』：“大军以固，多力以烦，堪物简治，见物应卒，是谓行豫。轻车轻徒，弓矢固御，是谓大军。密静多内力，是谓固陈。因是进退，是谓多力。上暇人数，是谓烦陈。然有以职，是谓堪物。因是辨物，是谓简治。”司马法集释，卷中，定爵第三，中华书局，2018，109。

57) 武臣须知·经权篇，41b。

满盘俱失”的教训。⁵⁸⁾当然，戒除轻举妄动的同时，还要处理好“权谲”与“仁义”的关系，“权谲而无仁义，一团虚诈；仁义而无权谲，一团迂阔”，也就是说，只讲仁义不懂变通，“专用迂阔，则事不省”，无异于胶柱鼓瑟；而“只取虚诈，则信不立”，⁵⁹⁾作为大将，也走不长远。

作为通达经权机宜的将帅，还应懂得兵法中“奇正”的灵活运用。“无正不成奇，无奇不成正”，“正，合也；奇，分也”，苻坚淝水之败、吴汉平蜀之捷，就是因为前者“合而不知分”，只知用正而不知用奇；后者“分而能知合”，既能用奇还能用正。所以，李氏父子建议将帅在作战时，“正兵一遵古人之法而正齐也，奇兵每随即景之见而变动也”，因为“无正兵则奇无所恃，无奇兵则正无容手”，正兵和奇兵是“体用元不相离”的一体两面，要结合使用。进一步说，“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自奇正而见”，将帅要先了解敌我双方的虚实情况，即彼此的“乱饿物弱，劳寡不虞”与“勇强治饱，果佚有备”的真实情形，再使用奇正兵法，让我军从容应对，敌方疲于奔命。李氏父子坦言，此即『李卫公问对』里所言“虚实之大旨，不过致人不致于人”的精髓要义。⁶⁰⁾

懂得灵活转换攻守思维，是优秀将帅所必须的素质。“攻时思守，守时思攻，即终而复始、久而更生之法也”，在作战时，遇到不可战胜的情况，就选择防守；若是可胜，就选择进攻。攻之法，“在示敌以有余”，同时也可“易为守也”；而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平常亦“寓于攻之中”。也就是说攻守之法，一定要随机权变，因事制宜。⁶¹⁾追溯这一思想的古老源头，其实是朝鲜王朝兵家

58) 武臣须知·经权篇，41b—42b。

59) 武臣须知·经权篇，42b—43a。

60) 武臣须知·经权篇，43b—44a。又按『李卫公问对·卷中』记载了唐太宗与李靖对奇正用兵之法与“不过致人不致于人”的具体解释，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中，中华书局，2016，42—43。

61) 武臣须知·经权篇，44a—44b。

常读的『孙子兵法』。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进一步讲，“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曹操亦云：“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⁶²⁾换言之，力有余时则攻，不足则守，平常在战略上要以少防多（守之法），战术上要以多攻少（攻之法），即根据实际战况，集中自己的一切优势，该防守时全面防守，该进攻时果断进攻。

灵活转换攻守之法，也是弱而胜强的必要途径。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就是水火攻法。“水火佐攻，弱而胜强，的量机宜，鼓舞倡率”。佐攻，就是“校势而攻外”，每当我方“形势单弱”，则可用“火攻水淹之计”来以弱胜强。三国周瑜赤壁火攻、关羽水淹樊城，都是“挟其水火之势而制胜”。故必须“酌量事机之可宜，乃发方策”，并且还要“倡先导率”，“使吏卒临阵对敌，以恩信舞之，以勇武鼓之，惟令是从，无所不往，然后可得以一当百”。⁶³⁾这样就能转弱为强，反守为攻。

提前筹划，决胜千里，是优秀将帅取得成功的先提条件之一。李氏父子言：“樽俎帷幄，以策筹之敌之虚实，了然在吾目中，此正道也。孙子所谓贵于庙策，尉繚所谓胜于朝廷者是也。”预先打探、了解敌我双方虚实长短，就会“明若观火”，将帅心中“必有所参详而如合符契”，战事便成功了一半。同时，也不要拘泥所谓兵法，更不要对自己以往经验过度依赖，因为战争之中形势百变，“兵之机括在于簸弄之如何，运动转移之间，差之以毫厘则谬于千里”，所以“善出奇者，不蹈前辙，不践往迹，神一心之方略，创造自家新样件事，而必出于人所未见未闻”，必当“心领神悟、融会贯

62)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69—71。

63) 武臣须知·经权篇，44b—45a。

通、不拘不就”，就可以“色色层出”、奇计迭生。⁶⁴⁾孙子所谓“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⁶⁵⁾其实亦是此理。

『孙子·九地篇』曰：“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⁶⁶⁾韩信背水一战、项羽破釜沉舟，都是这种情况，本质上是在危险的情形下，切断后路、摈弃杂念而殊死一搏的险招。李氏父子亦指出，“漏船烧屋，何等时刻，愚者亦智，怯者亦勇”，既然陷在“十分闷迫之中”，则“其节甚短，其势甚险（险），其于作为，间不容发”，稍稍迟疑就会万劫不复。⁶⁷⁾因此，要懂得在“静若处子”的同时“动若脱兔”，“韬形敛迹，幽比鬼神，势迅声烈，疾若雷电”，起初则“排兵布阵，藏形内治，审时度势，相机因变，阴谋秘计，寂然潜然”，遇到危机时刻及一闪而过的军事良机时，就要“布旗扬尘，结草列炬，出东见西，攻南引北，虚张掩袭，纷然哗然，搴旗斩将，而夺其心、拔其城”，这是一种“瞬息间功力”，所有“吃紧关头，只在此中”，⁶⁸⁾所以不可不审慎学习、牢牢掌握。

同时，还要注意用间之法。“善间者，食息起居，何殊临阵；声音笑貌，威为藏机”。这种用间之术，也是“用奇”的难点。“巧辞钩致，探其真伪；喜怒动作，察其举止，乘其虚懈，暗通情理”，孙子论用间有五：“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又曰：“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无所不用间也。”⁶⁹⁾李氏父子认为：“间法奚翅难世而用之，我国全无此法之行，安能无泄泄处耶？”⁷⁰⁾悲叹朝鲜兵家鲜少用间，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本国军事的忧虑。

64) 武臣须知·经权篇，45b—46b。

65)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87。

66)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九地篇，261。

67) 武臣须知·经权篇，47b—48a。

68) 武臣须知·经权篇，47b—48a。

69)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下，用间篇，291—298。

70) 武臣须知·经权篇，48a。

当然，用间属于奇策，任何的用奇之策都必须有着坚实的战争后勤作保障。孙子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其实就是要先制造对己方有利的条件作保障，把条件都准备的好一些，再考虑作战。⁷¹⁾具体到战争发动前的环节，就要“百物齐备”，才可以“军心快足，军令不烦，纪律不胥”。当“攻守之器械及军装等物”已经“色色准备”之后，“而主将得策，亦多于料敌”，则“一军之心自然慷慨”，消弭“内惧不足之患”。在器械完备的同时，还要做到纪律简洁而严明，纪律松弛则无斗志，“古者春振旅、秋治兵，乃不忘战之意也”，所以要严格治理，著者说自己“随行军门已多年所矣，稔知此弊之无余”，⁷²⁾所以非常强调此等道理。

不过，在重视纪律法令的严格执行以外，也要注意实事求是的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因为“与其从令而败事，不若违制而成功，此则权道也”，从统领一军之大将的角度言之，要做到“君命有所不受”；从领偏师别旅的裨将将领的角度看，则要做到“临时应变，不拘节制”，也是孙子所谓“悬权而动”，⁷³⁾即在战前就要像悬着砝码量物品那般，仔细权衡敌我双方优势劣势形势及利害关系，根据实情通达权变，从而在战时占据先机、克敌制胜。⁷⁴⁾

IV. 『武臣须知』的阵法观

『武臣须知』将阵法列在第三位描述，是因为李氏父子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百战百胜”的“上之上者”，阵法本身属于交战

71)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69。

72) 武臣须知·经权篇，48b—49b。

73) 武臣须知·经权篇，49b—50a。

74) 悬权而动，曹操曰：“量敌而动也。”李筌曰：“权，量秤也。敌轻重与吾有铢镞之别，则动。夫先动为客，后动为主，客难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计之算，明动易也。”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军争篇，144。

过程中实际性的军事经验，本质上只是工具。总体而言“上兵伐谋”才是最佳的计策，用兵动武乃属不得已。⁷⁵⁾但如果非要动兵，则不得不学阵法，而要精通阵法，不仅要懂具体布置，还要培养如下的理念：

学阵之先，便要“称众”，学会“因地因敌，令阵即战参也”。称即称量，参即机参。阵有方圆大小，地有险易广狭，敌有众寡虚实，惟在主将之“参详所见而料度于心上自得矣”。赵奢先据北山，孙臧埋伏马陵，都是“于未然之前已区画者”的例子，此即孙子所谓“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的最佳诠释。⁷⁶⁾书中认为目前朝鲜军营存在“等闲看过”、没有“称众因地”的弊端，姑且记下朝鲜“禁军七番，都监马兵六哨、步军三十六哨，禁营骑士十四番，步军一百二十五哨”的这类布置，以待将来“据战参数生称之义”，⁷⁷⁾冀望未来将帅根据实情能够衡量军机、灵活排布。

作为将帅，了解阵法不难，实际操作却很难，“非阵之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在古代，兵农合一，军事单位与阵法布置来自于生产生活实际：“治兵藏于农，而一井分为四道八家共处之，以此为阵法，则前、后、中、左、右五处，而以四隅为空虚不用之地，是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心而至于余零之处则大将握而居之，故四面诸部之军皆连续于外无所断阙，是数终于八也。”古人的阵法是与自己的具体认知经验密切相连的，但随着时代变迁，今人只是徒然模仿数目，根本不知道为何五军排营、八隅连阵，根本不懂“制变”。⁷⁸⁾这样的阵法也只是纸上谈兵，作用不大。

关键的是，具体的一些布阵之法，将帅们未必能完全了解：如

75) 孙子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50—51。

76)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虚实篇，124。

77) 武臣须知-阵法篇，58b—59a。

78) 武臣须知-阵法篇，59a—59b。

布阵时要懂得“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前老后壮”，“一奇一正，或长或短，运动不一”，前以老卒以“诱诳”敌人，再以“中权后劲”以应战之，此是能屈能伸之道，当然“转换变更之心，与长短互卫之心无异也”，作为将帅，虽要懂“屈伸之法”，而“心则不可变改也”。在内心要坚定志向，在外表要灵活变换，用外在的灵活来扞卫内心的恒定，“外似奔趋追逐，内实金石其肠”。再如，布阵时要懂得“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意即“八阵八门之法”、“四头八尾四正五奇之形”，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是八阵，关、休、生、伤、杜、景、死、惊是八门，“坐作疾徐、进止宽猛”之间，自有“体用互施之节”；布阵时还要懂得“一合一离，阴其谋，高其垒，伏其锐，寂然无声”，要懂得能分能合，懂得“诡伏设奇”（比如佯败诈降）；更重要的是，布阵时要“前却有节，应麾无乱，虽绝成阵，虽散成行”，如果没有李广那种军纪散漫却能远派侦察、百里奇袭的天分，那就老老实实学习程不识严格治军。要保证部下在主帅行兵布阵时完全听从号令，万人如一心，达到“若一人之动作惟命是从”的程度。要能够“一旗指一号令，而不过一举手一开口之劳”，⁷⁹⁾也就是说主帅一句指挥，部下迅速听令布阵行，惟其如此，阵法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在李氏父子看来，朝鲜半岛的民风是“北气锐而易惰，南人劲而耐久”，“八方风气与人禀有万不同”，所言必须“因其所惧而从事”。具体说来，“风习都（汉城）、鄙（地方）悬殊，训局乃京军，锐而易惰；两营是乡军，劲而耐久”，所以为将者不可不察，只有“因其俗而教导之民，易从令矣”，根据军兵的习性不同各作不同安排，麾下的军兵才会更加听从主将的行兵布阵。同时，主将也要注意调整布阵作战的节奏，使这种节奏很够符合形势、切中肯綮，既不能怠慢，也不能过火，“不论主客、迟速，能发而中节，

79) 武臣须知阵法篇，60a—62b。

则变客为主、转劳为佚”。⁸⁰⁾这也符合诸葛亮所谓“观其衅变，诫命一上将南向完洛”的古训。⁸¹⁾

主将在夜晚布阵之时，要灵活使用“火鼓”，也就是火把与金鼓，“火鼓多者所以震慑视听，威武声气”，在深夜中，“言不相闻，视不相见，故为之多火多鼓”，且要随时使用“通变之道”，或“训卒抹马，利兵蓐食，潜师夜起”；或“卧旗息鼓，屏锋蓄锐，以待可时及其发用之机”，或“多设疑事，扬声奋臂，虚张掩袭，使之诳惑，以致成功”，这便是“夜阵不一之规”。夜间的布阵，其“徐促节次”，要和白天一样谨慎，不可“小忽”。此即孙子所谓“变人之耳目，可夺三军之心、将军之气”，⁸²⁾李氏父子认为“我国（朝鲜）人心，本好夜惊，而近来绝无夜操之习，若遇仓卒，则似难镇压之道矣”，所以平日要居常飭励，加强练习。

“有备其生处，无备其死处，此阵法之大体也”，阵法当中，“识虚实”为第一。晋侯闻乌鸟之声而知齐师必遁，周亚夫见敌奔东南而使御西北，都是“虚虚实实”、变化“无限神通”的战法。李氏父子援引戚子曰：“制胜之妙，如走珠转丸，宁复有秘？不可言喻而可以心授者，感召之道也。”由此认为：“以此观之，人事之外无他道可判无疑也。”⁸³⁾其实，这种思想来自于戚继光『纪效新书』的练兵之法：

制胜之妙，如走珠转丸，宁复有秘？盖有不可以言喻，而可以意授者，感召之道也。忠诚恻怛，实心实行，艰苦居士之先，利便居士之后；知我士情，使众由之而不觉；知敌虚实，使众蹈之而忘危；驱万人以意，而不在于刑戮之宽猛；悦万人以心，而不在于材

80) 武臣须知·阵法篇，62b—63a。

81) 李氏父子的此句引用有误，原文应是隆中对：“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913。

82) 武臣须知·阵法篇，63b—64a。

83) 武臣须知·阵法篇，64a—64b。

货之重轻。⁸⁴⁾

布阵作战，本质上就是指挥官（主将）在了解敌方“人”的强弱情形，通晓我方“人”的优点劣势的前提下，驱使安排“人”这一要素，组成最佳配置，获取胜利的方法。不管是利用什么阵型、战术，本质上都是同一目的。从阵法角度论，九宫、八阵、六花，虽有增减、方圆之不同，“其所从来俱是一法也”。相传诸葛亮于夔州“垒石为文”，“纵横八行”，是“八八六十四小方阵，而比九宫减一十七”，可谓神机变换，不拘一格，总归出自一心，而不死板教条。作战布阵，就是攻敌之心、壮我之气，“攻非但营阵而言，必攻人之心；守非但城壁而言，必守吾之气”，不管“奇权”还是“诡术”，皆不外乎此道。陈平反间项王、张良月夜吹箫、司马懿虽受巾帼之辱终不出战，都是如此。同时也要对我方军兵做到“与之安，与之危，投之无所往”，练成“父子之兵”，让“将、卒之心如相胶漆”；也要懂得“车徒不易转换，骑徒易于前冲”，根据地形安排车骑、步兵，比如深山坑谷用步阵，平原旷野用车骑布阵；还要做好军需运粮保障，才能使得布阵之时没有后顾之忧，同时还可以根据情况以我方军粮为诱饵设伏攻击敌人。⁸⁵⁾总之，布阵作战不仅仅是阵型的变化，更多的是人事的运用，“人”在阵法中才是决定性要素。

李氏父子强调，“阵法，行亦阵，止亦阵也。若不知分合奇正之术，而只从阵之为法，则是无实容长之归”，所以，他们抄录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战争史案例，分成十四类，便于记忆，意在“或可为推广之一助”，并希望将帅们常常学习，深刻体会，达到熟知默诵、知往鉴来的作用。

84) 纪效新书，卷14，练将篇第十四·附练将或问。

85) 武臣须知·阵法篇，64b—68b。

『武臣須知·阵法篇』阵法須知案例表

| 阵法須知簡則 | 歷史成功案例 |
|------------|--|
| 陣前嚴格“選士” | 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的稱霸；張遼守合淝；周訪討伐杜曾；唐太宗征宋金剛；謝玄選任劉牢之討苻堅 |
| 陣前徹底“知敵” | 文王伐崇侯；田穰直明法令；孫臏詐殺龐涓；王翦伐楚備六十萬卒；周亞夫堅壁拒吳軍；劉備不渡郭淮遠水之陣；慕容恪築室反耕；王猛臨終諫苻堅；于謹獻計長孫儉；唐太宗破竇建德于汜水 |
| 戰前須有“先察”之眼 | 史弭識破秦使；董褐識破吳王；宋義預見項梁有驕色，知其必敗；周瑜見曹公之冒進，知其必破；司馬懿聞亮食少事煩，知不能久；馬援見公孫述之盛陳威儀，知非帝王之姿 |
| 布陣先明“刑賞” | 曹操割髮自刑；武侯泣斬馬謖；呂蒙斬同鄉；李靖殺三使；孫武斬吳宮女；馬隆未戰先賞；吳子敗亦行賞 |
| 陣中臨機“權變” | 魏絳、穰直斬殺楊干、莊賈；孫臏令軍減灶；田單火牛陣；趙奢增壘之計；李牧佯敗破匈奴；韓信佯棄旗鼓陣誘龍且；度尚燒珍寶；呂蒙詐病渡江；司馬懿破襄平；段紀明擊鮮卑；楊素毀車誘突厥；李愬雪夜奪蔡州 |
| 陣中多用“伏兵” | 張良十面埋伏圍堵項羽；三國空城計；張齊賢破契丹 |
| 善用“水火”陣法 | 張孟談決水灌智伯軍；韓信決壅水囊以敗楚師；皇甫嵩火攻黃巾軍；周瑜火燒赤壁；關羽攻樊城水淹七軍；陸遜夷陵火燒蜀營 |
| 斗陣必守“心氣” | 宇文憲背水一戰吓阻段暢；薛仁貴脫盔 |

| | |
|-----------|--|
| | 惊走突厥；张辽身先士卒杀死敌将；曹刿论战 |
| 布阵须知“形兵” | 黄巾寇恂破苏茂之战；臧宫破延岑之战；朱雋声东击西斩黄巾；曹操诱败马超；曹、袁乌巢之战 |
| 行阵须果断“决疑” | 周武伐纣；刘裕破慕容超 |
| 结阵则“穷寇莫追” | 阖闾不追楚师；赵充国不追先零；曹操之破张绣、刘表；淝水之击退吕弘 |
| 行阵须配合“奇计” | 晋文公激楚将子玉；晁错以夷攻夷；马援讨武都羌；曹操一计安张辽、李典、乐进三将；白起屠赵军；范增劝击成阜；沛公绝栈道；陈平白登解围；李左车劝降之策 |
| 行阵须配合反间计 | 越王贿赂太宰嚭；廉颇中计不见用；齐王烹杀酈食其；陈平离间范增项羽；韦孝宽间杀斛律光；宋僧蜡丸帛书离间西夏 |

表格史料来源：『武臣须知·阵法篇』，73b—82b。

作为戎马倥偬的武人，寻章摘句非其所长，传授其过于简要的文字经验，也不利于其体悟。以简明扼要的十四种行阵原则，配合举出具体历史案例，是抽象的经验升华，与具象的历史性故事相结合，更便于将帅深刻理解。李氏父子的目的在于，通过生动简明而不繁琐的历史故事，让武臣们能将布阵之法、行阵要诀铭记于心，尽量规避理解不透、生搬挪用的弊端。

V. 结语

随着“两乱”以后半岛社会生产力与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朝鲜

王朝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升平安逸景象。18世纪尤其是正祖时代，是朝鲜王朝传统君主政治发展的“盛世”年代，正祖有着意图加强王权、创造新朝鲜的宏愿，但“盛世”之下，其实也渐渐显露出隐忧。正祖四十九岁去世后，童龄即位的纯祖，由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尽管继承了正祖的遗志进行国政经营，但仍存在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现象，贞纯王后去世后外戚金祖淳又逐步开启了势道政治，王权渐衰，朝纲不振，叠加地方官吏贪鄙、社会矛盾激化、自然灾害，最终导致1812年席卷北方的洪景来“两西大乱”。⁸⁶⁾李氏父子在国家还未呈现衰象之前，可以说就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认知到这种颓废的承平注定不能持续，所以必须慎修武备。『武臣须知』就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其对时局事机的预先敏感度，不可谓不强。

作为王室的远宗庶支，又通过武科科举加入了被当时潮流所轻视的武人阶级的李氏父子，毕生仕途基本上还是地方中下层武官。这些境遇也影响了他进一步施展才华的空间。虽然正祖提拔了一批庶孽出身的官吏，但他的变革也随着他的薨逝昌庆宫而付诸流水。时代的一粒沙对人而言就是一座山，所以李廷[火集]终其一生，尽管“才气识略，过绝流辈”，仍然无法和整个朝鲜王朝森严的等级社会抗衡，“造物有猜，官才内外将”，沉沦下僚，郁郁而终，“卒年为四十二”，“知旧相闻，孰不叹惜”。⁸⁷⁾李迪在中年之时，才是在朝鲜南海一带担任县令，可以说仕途蹭蹬困顿，有志难伸。『武臣须知』就是这对胸怀韬略却壮志难酬的父子的绝唱，连当时的领议政李秉模作序时都坦言希望“观此书者”不要以李家父子“官微言轻”就忽视之，⁸⁸⁾一股苍凉悲壮感油然而生。其实，该书也确实在

86) 关于洪景来起事的政治性质，可参吴洙彰(2006)。19世紀初中國八卦教亂鬥比較研究：洪景來亂亂政治的特性，『大東文化研究』總第56號

87) 武臣须知·阵法篇，84a。

88) 李秉模，武臣须知序，武臣须知，1a。

日后的实际作战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乃至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式兵学对东亚传统兵学产生了较大冲击，『武臣须知』这类东亚传统兵书则更加泯然于世、不为大众普遍了解。

正如前贤所考证，18世纪末的正祖时期，是各种兵书纷纷刊印的鼎盛高峰期，也是全面整理朝鲜王朝的传统战略与兵书旧典的阶段，兵书编纂数量庞大，且有较强的目的性-也就是为国防问题服务。⁸⁹⁾『武臣须知』的产生，也与这种兵书编纂热潮密切相关。换言之，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前半期，由于这一时期对外危机的逐步兴起，加之当时正祖富国强兵的思维导向，使得从朝堂到地方，都有不少人士投身于此：正祖本人在其在位末期曾尝试重新整理注释『武经七书』，尽管后来没有完成；文官如丁若鏞撰写『民堡议』，带动起民堡防御的关注度；至于武将，则亦未缺席，其中多人试图撰写兵书，阐述自己的兵学心得，如梁垞撰『握奇图说』、宋奎斌『凤泉遗响』、赵羲纯『孙子髓』、赵禹锡『武备要览』，等等。李氏父子的『武臣须知』是肃宗乃至正祖以来的兵学编纂热潮下，武人呕心沥血培育出的兵学之花。

李家父子热心阅读兵书，对『武经七书』及『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颇能精熟，他们深入地参与到了对这些知识进行阅读注释并内化改造的过程当中。比如针对刘寅的直解注释，他们就觉得“刘注多失本意，因置不改，则古名将立言垂后之功泯而不传，又非暗合孙吴之才，而学而得之者亦劳而无功，可胜叹惜”，虽然朝鲜官方还没有注意到改修的必要性，但李廷[火集]在著述『武臣须知』之余，把刘注又做了若干修正，汇总起来，命名为『韬铃旨归』。三十年后，朝鲜官方果然开始修正刘注，李迪不禁感叹其父的先见之明。⁹⁰⁾可见，李氏父子对中国传统兵学及其影响下的朝鲜王朝兵学，都有着较为深入透彻的理解，『武臣须知』既是父子二

89) 卢永九(2000). 正祖代兵书刊行的背景与推移, 藏書閣, 3.

90) 武臣须知-阵法篇, 64a-64b.

人久浸兵法的自出机杼，又暗合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朝鲜传统兵书整理的时代脉搏。

【주제어】 이정집·이적부자, “무신수지”, 장재, 경권, 진법

[參考文獻]

- 甘成海、成百曉翻譯 (1986). 무신수지. 서울: 국방부전사편찬위원회.
- 金明淑 (2004). 19세기 전반기 해석 金載瓚의 정치활동와 정치론. 한국사상과 문화, 25.
- 盧永九 (2000). 正祖代 兵書 刊行의 背景과 推移. 藏書閣, 3.
- 盧永九 (2002). 朝鮮後期 兵書와 戰法의 研究. 서울: 서울大學校國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
- 盧永九 (2017). 조선시대 武經七書의 간행과 활용의 양상- 武經七書直解의 도입, 간행을 중심으로-. 조선시대사학보, 80.
- 吳洙彰 (2006). 19世紀初中國 八卦教亂과 比較한 洪景來亂의 政治의 特性. 大東文化研究, 總 56號
- 尹武學 (2011). 中國 兵書의 유입과 지식인들의 이해 양상. 한국철학논집, 31.
- 尹武學 (2013). 朝鮮 後期의 兵書 編纂과 兵學 思想. 한국철학논집, 36
- 鄭海恩 (2004). 한국 전통 병서의 이해. 서울: 국방부군사편찬연구소
- 崔炯國 (2012). 正祖의 文武兼全論과 兵書 간행 - 認識과 意味를 中心으로 -. 역사민속학, 39.
- 崔炯國 (2018). 병서, 조선을 말하다. 서울: 人物과 思想사.
- 張曉波、崔軾男 (2016). 禁通之間: 朝鮮王朝庶孽制度初探韓. 韓國研究論叢, 總36.
- 璿源系譜紀略.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刻本.
- 敦寧譜牒.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刻本.
- 癸未大増廣別試文武科榜目. 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本.
- 朝鮮王朝實錄. 國史編纂委員會官方數據庫.
- 黃珪 (1955). 梅泉野錄. 서울: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
- 李廷[火集]、李迪 (1809). 武臣須知,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藏朝鮮純祖九年芸閣印書體混補字版本.
- 魏汝霖 (1976). 黃石公三略. 台北: 台灣商務.
- 梁運華整理 (2004). 管子校注. 北京: 中華書局.
- 楊丙安整理 (1999). 十一家注孫子校理. 北京: 中華書局.
- 陳曦整理點校 (2021). 吳子集釋. 北京: 中華書局.
- 蔣禮鴻注解 (1986). 商君書錐指. 北京: 中華書局.
- 陳曦整理點校 (2016). 六韜. 北京: 中華書局.
- 王震校注 (2018). 司馬法集釋. 北京: 中華書局.
- 陳乃乾點校 (1982). 三國志. 北京: 中華書局.
- 何寧整理 (1998). 淮南子集釋. 北京: 中華書局.
- 吳如嵩、王顯臣校注 (2016). 李衛公問對校注, 中華書局.
- 駢宇壽等譯注 (2020). 武經七書, 中華書局.

- 陈建中、黄明珍点校 (2017). 武经总要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马明达点校 (1988). 纪效新书 .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 邱心田整理 (2001). 练兵实纪 . 北京: 中华书局.

[국문초록]

정조 말기와 순조 초기에 영장을 지낸 이정집과 그의 아들 이적은 “손자병법”을 포함한 “무경칠서”와 척계광의 “기효신서”, “연병실기”를 읽은 후, 자신의 체험을 바탕으로 “무신수지(武臣須知)” 편찬하였다. 이 책은 주로 장재(將才), 경권(經權), 진법(陣法)의 세 단계로 나누어 이전의 병학 경전을 실제 사례와 결합하여 조목조목 분석한다. 군사 인재의 선발과 양성, 전쟁 과정에서의 일반적인 원칙과 당시 실정에 맞는 변화, 작전 진법의 본질과 그 신축성 있는 사용을 중점적으로 강조하였다.

이 책은 조선 후기 무장 병학교육의 전통 경험과 실전 인식을 비교적 전면적으로 총화하고 응축하였다고 할 수 있으며, 장수들 간에 열독하고 기억하며 이해하는 데 편리할 뿐만 아니라, 일반 무학 애호가들이 깊이 체득하고 응용하는 데도 유용하다. “무신수지”의 편찬은 사실 이씨 부자의 깊은 병학적 소양에서 비롯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비록 뜻을 이루지 못했지만 저술하여 무비를 정돈하고자 하는 지향과도 관련이 있다. 또한, 18세기 후반부터 19세기 초반까지의 병서 편찬 열풍의 영향을 받아, 그 시대의 거안사위(居安思危)와 신수무비(慎修武備) 의식의 산물이라 할 수 있다.

[Abstract]

**Military Philosophy of Warlords at the End of King Jeongjo
and Early King Sunjo of Joseon**
– Research Centered on the *Mushinsuji*

Xu Cheng (Korea university)

At the end of King Jeongjo's reign and the beginning of King Sunjo's reign, Lee Jeong-jip and his son Lee Jeok, who had served as local battalion generals, compiled a book titled *Mushinsuji* (Instructions for Military Officials) based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after reading *Wujing Qishu* (*Mugyeong Chilseo*), *Jixiao Xinshu* (*Gihyoshinseo*) and *Lianbing Shiji* (*Yeonbyeong Silgi*). The book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namely, *Jangjae* (general talent), *Gyeongkwon* (the principle of fixity and flexibility), and *Jinbeop* (array method), and the classics of military science in the past are analyzed in detail with practical cases. It emphasizes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military personnel, general principles in the course of war and chang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 essence of combat formation and its flexible use. It can be said that this book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and condenses the traditional experience and actual combat cognition of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of Joseon, which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reading, memory and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s, but also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 martial arts enthusiast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ompilation of *Mushinsuji* not only originated from the profound military knowledge of Lee's father and son, but was also related to their ambition to write in order to rectify their military equipment. Furthermore, it is influenced by an upsurge in compiling military books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hich was the produc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prepared for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and being cautious in military equipment in that era.

[Keywords] Lee Jeong-jip and Lee Jeok, *Mushinsuji*, *Jangjae*(general talent), *Gyeongkwon*(the principle of fixity and flexibility), *Jinbeop*(array method)

논문투고일: 2024년 06월 22일 / 논문심사일: 2024년 08월 12일 / 게재확정일: 2024년 08월 27일

【저자연락처】 xuchengstudium@163.com